

大理白族自治州建州六十周年纪念

白族族源新探

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院 编

● 云南出版集团

● 云南人民出版社

《白族族源新探》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杨 宁 杨 健

顾 问：张如旺 洪云龙 赵济舟

主 编：赵润琴

副 主 编：赵克选 李德忠

常务副主编：李 公

编 委：丁达贤 张云霞 杨建伟 刘纯洁 杨晓霞
赵树兴 杨海青 宋宏丽 李丽珠 严 佳

编 务：严春华 吴兰香 石维良 杨庆现

摄 影：杨士斌

目 录

序 言

白族族源研究综述 赵启燕 (1)

初 探 (1957年)

略论白族的形成 方国瑜 (103)
试论云南白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杨 垄 (111)
关于白族族源问题 王叔武 (122)
关于白族起源的争论 任 方 (146)

再 探 (1958年 ~ 2015年)

“关于白族族源问题”质疑 王 忠 (155)
白族及大理古代文化的来源 徐嘉瑞 (167)
从白族的自称和他称看其族源 张 旭 (175)
白族异源同流说 马 曜 (191)
白族形成问题新探 林超民 (213)
从考古材料看白族的起源 李东红 (275)

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	(日) 林谦一郎	(289)
白族源流之管见	段鼎周	(353)
从考古资料看白族的源流	田怀清	(364)
再论白族的起源和形成	李公	(375)

新 探 (2016年)

洱海：白族的母亲湖		
——略论白族的起源和形成	栗 标	(389)
从洱海区域的考古新发现看白族的形成和发展	杨翠微 杨政业	(407)
关于白族族源研究的几个问题	苏松林	(426)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换一种视角看白族族源问题	张建平	(442)
从白族称谓演变看白族族源	杨庆春	(456)
白族起源若干问题刍议		
——兼论白族的源与流	杨纯柱	(465)
试论洱海地区与白族的起源	刘纯洁	(481)
白族族源的再讨论	杨建军	(492)
白族族源研究论著篇目索引	严 佳	(512)
后 记		(521)

白族族源研究综述

赵启燕

白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历来是白族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领域。19世纪晚期，西方学者拉古伯里提出“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这一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广泛传播，得到英、法、德、美各国学者的认同和支持。为了正本清源，探求白族的起源问题，驳斥西方学者的谬论，国内老一辈专家学者开始研究白族的族源问题，从而引发了关于白族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大讨论，形成了关于白族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第一个研究热潮。20世纪50年代，随着民族识别、社会历史调查、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白族研究活跃起来，进入了以社会进化论与阶级斗争为纲的研究时期。学术界再度掀起研究白族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热潮，形成关于白族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本土说、外来说和多元融合说几大观点，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洱海区域考古和泰国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和大批考古成果的出现，“南诏泰族王国”说被中国学者彻底否定。西方新一代“汉学家”和东南亚史学者，包括泰国学者均对这一理论提出质疑、批评和否定。“南诏泰族王国”说宣告“破产”。同时，新资料的发现、新理论的吸纳和新方法的运用，推动了关于白族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新热潮的出现，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创新。

一、早期对白族起源和形成问题的论争 (1876年~1948年)

(一) “南诏泰族王国”说的提出

最先将南诏历史与泰族史联系起来，主张“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这一观点的是法国贵族戴·哈威·圣丹尼斯 (D.Hervey de Saint—Denys)。1876年，他在法国出版《中国的哀牢族》一书，提出哀牢的后裔泰族人建立南诏的观点。^①然而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1885年，英国著名学者拉古伯里 (Terrien de Lacouperie) 在为A.R.柯奎的著作《在掸族间》所写的一篇题为《掸族发源地》的导言中提到：我们对牢人或者哀牢人的发祥地要比其他族的发祥地知道得更清楚。根据他们的传说，他们起源于牢山。这座山位于河南、湖北和安徽等省的交界处，从那里向西延伸，直到九龙山脉。九龙山脉构成了陕西和四川的交界地。错误地将牢山与哀牢人的发源地联系起来，认为神话传说中南诏祖先的发祥地九隆山即在陕西和四川的交界地。他进而指出：泰族原居于四川、陕西山谷间，与来自中国北方之民族渗混，复与蒙古蔑语族杂居，遂成泰族。在此基础上，拉古伯里提出了“泰族在公元629年建立了大南诏国”，“完成了业已由楚国开始，由滇国继后的对泰掸族的统一事业。……自公元860年起，它以大理国的国号继续生存，直到被蒙古人征服”的论断，将中国视为泰族的发源之地，系统地提出了“南诏泰族王国”说。^②1887年，拉古伯里发表其著作《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在这部著作

^①参见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②Terriende Lacouperie: *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 IntroductiontoA.RColquhoun (1885, Amongstthe-Shahs.)* 参见(中国台湾)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中国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出版，1982年；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沈静芳：《泰人建立南诏国说质疑》，载《东南亚》1989年第2期。

中，他进一步宣称在中国人从西亚来到中国以前，当地最早的居民是泰人。^①

“第一个通过中文史籍来研究掸族史的学者却是英国驻贵州领事E.H.帕克。”^②帕克（E.H.Parker）有关云南史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两篇研究云南史事的论文上，即《古代的僚族与中国》（The Early Laos and China）和《西南部云南的古代泰掸帝国》（The Old Thaïor Shan Empire of Western Yunnan）。在《古代的僚族与中国》一文中，帕克翻译并引用《后汉书·哀牢夷传》和《新唐书·南诏传》的相关史料，认为哀牢夷是掸族的祖先。僚族的“僚”，在语源上同于哀牢的“牢”，其祖先又曾居住在哀牢山下，因此以此为名称，称为哀牢。同时，他又以今天越南人仍旧用哀牢称呼其西邻的掸族为证据，证明其观点。在其论文《西南部云南的古代泰掸帝国》中，他提出：南诏是掸族，白崖是唐代掸族的统治中心，进而推断滇亦为掸族。虽然“巴克氏（即E.H.Parker）之中国历史知识极为贫乏，故行文之间，时生笑谈”，“巴克氏对中国历史知识，浅显如此，而望其论文不误人误己，殆不可能”^③。然而，他以中文史籍文献为依据，进一步支持和发展了“南诏泰族王国”说，使得这一理论在西方学界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和认可。

此后，法国学者洛色（E. Rocher）撰写《中国的云南省》（La Province Chinoise du Yun—Nan）和《云南王史》（Histoire des princes du Yun—nan et de leurs relations avec la Chine d'après documents Chinois, 1885）两篇论著，对云南的历史、地理和民族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对南诏历史有所论述。^④

^① 参见沈静芳《泰人建立南诏国说质疑》，载《东南亚》1989年第2期。

^② [泰] 威奈·朋希边撰，路敏译：《南诏与素可泰的产生：20世纪对泰族起源问题的辩论》，载《东南亚》1991年第3期。

^③ （中国台湾）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第13页，（中国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2年版。

^④ 参见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897年，法国学者邦德里（Pierre Lefeure Pontalis）发表《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 Invasion Thaïe en Inde—Chine）一文，对泰族的起源和历史进行考证。他认为：泰族原先居住在中国，后因受到中国的压迫和利用才几经南徙，迁到中南半岛，并考证其南迁时代，从后汉一直延续到忽必烈攻灭大理国为止，以此来论证南诏为哀牢夷后裔，其源于九隆系统的观点。^①

1900年，法国学者沙畹（Chavannes）将《南诏德化碑》译为法文。其后，法国人赛尚（C.Sainson）又将《南诏野史》翻译为法文。两种史料的翻译极大地推动了南诏史和泰族历史的研究。进入20世纪初期，西方学者如戴维斯（H.R.Davis）、柯克兰（W.W.Cochrane）、伍德（W.A.R.Wood）、杜德（W.C.Dodd）、克勒纳（W.Credner）等均对泰族历史和中国西南民族史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并出版发表了一系列论著，继承和发展了“南诏泰族王国”说。

英国学者戴维斯于1894~1900年间，先后四次到云南进行考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撰写了《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一书。书中仍支持南诏是泰族建立的观点，并进一步对大理的名称进行了解释：“我认为大理的名称源于掸语‘tali’，意思为‘好渡口’，这完全是我的猜测，但因为掸人几乎可以肯定曾经在这儿居住过，而且离城不远的湖边还有一个渡口，这种推论似乎是可靠的。”^②

在一系列论著中，“对泰国人造成重大影响者，首推杜德（W.C.

^①Pierre Lefeure Pontalis: L' Invasion Thaïe en Inde—Chine, 此文分上、下两篇, 上篇见《通报》第一编第八卷(1897年), 下篇见《通报》第二编第十卷(1909年)。陆翔将其译为中文, 载开明《国文译证》, 第69~113页。参见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 第10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中国台湾)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 第13~14页, 中自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2年版。

^②H.R. Davis: 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 River (1911, London)。参见李安泰、和少英、邓立木、何昌邑、鲍江译:《云南: 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 第79页,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Dodd) 之《泰族》(The Tai Race)一书”。^①1923年，在暹罗的美国传教士杜德出版其专著《泰族》一书。书中对泰族的古代历史进行了论述：溯自中国境内之泰族人，已失其自由垂七百年之久，照彼等尚能保全泰族固有之文化，而不为汉族所同化，仅就语言一项而言，今云南之泰族人犹操其纯粹的泰语。……但若从泰族历史视之，当知全部泰族，即大泰与暹罗之泰族皆系原始的泰族（指中国境内西南部的傣族），故非热带原有之民族也。其实泰族已在北部领有三千四百年之发达文化，较其迁徙入热带领土之时间为长久，而且具有完善的政治组织亦垂四千年。顾当其时吾人之祖先尚在穿着兽皮及使用石器之时代。^②他认为泰族发源于中国华北的黄河流域，后因汉族压迫，南迁到云南并建立南诏。至公元13世纪，元朝军队攻灭大理，泰族才迁到中南半岛，建立了暹罗王朝。

其后，英国学者伍德撰写了《暹罗史》一书，亦强调哀牢夷为泰族祖先，认为三国时的南中大姓孟获是泰族王，唐代六诏和统一洱海区域、进而统一云南全境的南诏是“泰族复告独立，蔚然成为强盛之帝国”。^③同时，在论及中国古代疆域时，他又指出中国古代的疆域不曾超过扬子江以南，江南各地实属蛮夷，其中大半为泰族。^④伍德在《暹罗史》中对“南诏泰族王国”说的鼓吹“很快成为南诏傣（泰）族建立论的代表性学术著作，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大的影响。泰国的历史著作、中小学教科书、旅游指南等著作都反复重复南诏是古代傣族在云南建立的伟大国家。南诏历史的光辉时代成为不少泰国人妄自尊大的历史资源”。^⑤

^①（中国台湾）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第15页，中国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2年版。

^②杜德：《泰族》，已被棠花节译为汉文，题为《泰国境外的泰族》，载暹京中原报社出版的《泰国研究》第一卷。参见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第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③参见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④参见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⑤林超民：《白族形成问题新探》，载林超民主编《民族学评论》第二辑，第305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此外，德国学者克勒纳也撰写《南诏故都考察记》一文。这篇文章同样持“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的观点，将皮罗阁说成是“泰皇子”，认为云南省会昆明，是在民国时期才改称为“昆明”，其原因是“为了纪念三世纪之孔明”。^①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如铃木俊、曾我部静雄等也对南诏历史进行了研究，并发表《关于“南诏”的字义及六诏的住地》和《关于越析诏（磨些诏）以及磨些蛮的住地》等论文。^②这些论文主要探讨了有关唐初洱海地区六诏的名称、地理位置等相关问题，在涉及南诏族属时“都异口同声说八世纪的南诏国为泰族所建。有的还说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大理国也是泰族建立的，元朝忽必烈占领云南以后，才把泰族驱入暹罗”。^③

“南诏泰族王国”说的提出，在一开始就受到部分实事求是、汉学研究功底深厚的西方学者的质疑。如法国学者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就曾指出：“有人假定此南诏民族属于傣（Thai）种，然此项种族源问题现在尚不明”，“南诏王父子以名相属之事，世人久已注意及之。子之名首一字，大致为父之名末一字。……此末一点无论如何解说，父子连名之习，在傣种地域之中似未重见有之。”^④其后，R.格鲁塞、H.马司伯乐等学者也对“南诏泰族王国”说进行驳斥，并提出南诏是罗罗建立的观点。^⑤然而，由于这些论述缺乏对“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系统分析研究和批判，也没有坚实的史料论证为基础，因此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和学术界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诏泰族王国”说在西方学术界广为流传，被学者们视为研究经典。不仅如此，这一理论还被泰国学界和政府

^①参见（中国台湾）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第17页，（中国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2年版。

^②参见〔日〕林谦一郎《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第5页，云南大学1995年博士论文打印稿。

^③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④〔法〕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载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交广印度两道考》，第196页，第201—202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⑤参见沈静芳《泰人建立南诏国说质疑》，载《东南亚》1989年第2期。

全盘接受，对泰国的学术界和社会思潮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泰国，最先接受和宣扬“南诏泰族王国”说的是被后人誉为“泰国历史之父”的泰国皇室共丕耶达吗銮拉查奴帕亲王。1924年，共丕耶达吗銮拉查奴帕出版《暹罗古代史》一书。在书中，他声称：据历史所传，泰族初发源于中国之南部，如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以前皆为独立国家。泰人散处各地，中国人称之为日番。至于泰之放弃故土，迁徙缅甸及老挝等地之原因，实由汉族之开拓领土。据历史所载，约在佛历四百年间，孔明起师征发番地孟获，以向西拓张其领土。此段记载，即为汉族南征泰族之记载，泰人既无力与汉族抗衡，又不肯受统治，不得已而移居西方，另辟新土。……泰人虽失其发祥故土之大部分，但非尽亡，尚能保有一部分原有土地，维持独立局面，至数百年之久；据中国方面记载，谓泰人有五个独立区域，合成一国，时在唐朝，称之为南诏，南诏王都昂赛，即今云南省大理府。泰人维持独立局面，直至元世祖忽必烈可汗在中国即皇帝位，始于佛历一千七百九十七年调动大军，征发泰国，至入缅甸境内，自彼时至今日，泰人原有土地，乃尽沦陷，变成为中国领土。^①

随后，泰国著名学者丕耶奴曼罗阁吞（即沙天哥色）在其所著的《泰掸族系考》中亦说：“诚然，泰族于南迁而建国暹罗之前，亦尝领有广阔之领土，在云南西境大理府建立都城，称强数百年，然以当时之泰族，未尝联合一统，顾其建都称强于大理府者，亦仅为一部分之泰族耳。是以不数百年，终不免为他族所亡。”^②

不仅如此，“南诏泰族王国”说还被暹罗政府全盘接受，为其修改暹罗国名为“泰”，以及鼓吹“大泰族主义”提供了理论和历史依据。1939年5月，暹罗政府国务院立案改国名为“泰”。暹罗国务总理銮披纹在改

^① [泰] 共丕耶达吗銮拉查奴帕：《暹罗古代史》，参见张凤岐《暹罗改名“泰国”与中国西南泰族之前途》，载《新动向》第三卷第四期，民国28年（1939年）11月出版。

^② 参见（中国台湾）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第18页，（中国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2年版。

国名告人民书中声称：在中国居留之泰族人，与汉族比较疏远；有一部甚至划定一特别区域，不受任何方面之统治。^①6月24日，暹罗政府正式改国名为泰国。暹罗政府改国名为泰国，固然有其内在的历史和政治原因。然而，从这一举措，不难看出暹罗政府鼓吹“大泰族主义”，妄图分裂中国疆土，建立一个包括云南全部、部分老挝、缅甸领土的所谓“大泰国”的阴谋。究其原因，西方学者提出的“南诏泰族王国”说对泰国学界和政界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西方学者对“南诏泰族王国”说的提出和大肆宣扬，以及暹罗政府改国号为“泰”，宣扬大泰族主义，妄图吞并中国边疆领土、分裂云南的恶劣行径，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愤慨。张凤岐发表《暹罗改名“泰国”与中国西南泰族之前途》一文，对暹罗建国历史、中暹关系、暹罗修改国号的原委、影响，以及欧美学者“南诏泰族王国”说的谬论进行阐释，分析这一谬说提出的原因，认为这一理论的提出“一方面在主观上先有一民族偏见成竹在胸，直欲分割我中暹整然一体的大民族为无数独立的民族小单元，以遂彼邦政治及领土分割之企图；客观上，则欧美学者不谙习我中国之语文及历史，致有曲解吾经传之重重错误。我国民族学之研究又成立较晚，西洋谬说迄今仍然独存，致今日为暹罗政府所利用，以推行深远莫测之侵略我边疆企图”。^②在文中，张凤岐先生批评“南诏泰族王国”说，认为“西洋学者，甚至所谓泰族权威之研究专家，其唯一错误，即在于误认白子为僰掸（即泰族之别名），殊不知两族，无论以语言及文化论，均判然两族也”^③，论及白族的族源问题，明确指出白族与泰族是两个民族。陶云逵先生在1939年6月昆明《益世报》专号（第7824号）发表《关于暹

^①参见张凤岐《暹罗改名“泰国”与中国西南泰族之前途》，载《新动向》第三卷第四期，民国28年（1939年）11月出版。

^②张凤岐：《暹罗改名“泰国”与中国西南泰族之前途》，载《新动向》第三卷第四期，民国28年（1939年）11月出版。

^③张凤岐：《暹罗改名“泰国”与中国西南泰族之前途》，载《新动向》第三卷第四期，民国28年（1939年）11月出版。

罗改国名为“泰”》一文，以民族学的立场，驳斥暹罗改国名的谬误，指出“……暹罗易名，难免不是受了这种思想（即亲日思想）的影响，而想向滇桂越缅之泰族伸手。泰族分布甚广，其族复分为若干支族，暹罗为其一。在中国分布于黔桂滇者名为仲、侬、僮沙、摆。在越南曰牢、茫。在缅甸为掸，或侥。这些人的语言系统，生活习惯和现在的暹罗人大体相同。设其改名果有用意，则未尝不可以泰族名称，在各泰族支族中大事宣传。……虽然中暹不直接交界，设暹罗果受他国蛊惑，未尝不可以缅越为波兰走廊而伸手到滇桂”^①，揭露了泰国受日本指使，妄图修改国名，以达到侵吞中国边疆领土的阴谋。其后，陈序经先生在《今日评论》（1939年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名为《暹罗与泰族》的文章，对暹罗政府修改国号一事也有所论述。1939年9月14日中国香港《天文台半周评论》刊载了顾颉刚先生《暹罗改号与中国之关系》一文，指出暹罗改国号，“一方面是表示这个国家，只是泰族的国家，另一方面又在表示，凡是泰族均应属于这个国家”^②，妄图将中国四川、云南、广东、广西四个地区以“收复失地”为名划归暹罗的野心。明确提出“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某一种族征服某一种族的事实（有的只是某个人或某一集团统一了中国境内的各色各样的百姓）”，“暹罗的泰族也更无自四川、云南、广东、广西被迫西迁或南迁的踪迹”^③，从而深刻揭露和批评了暹罗改国名的阴谋。周钟岳先生亦撰写《云南各夷族及其语言研究序》一文，根据云南历史记载，分析明代以前，“史籍之僰，绝非摆夷。……南诏国与后之大理国，皆即白蛮或松外诸蛮，断非掸人。……昔日建立南诏之蒙段子孙，始终未移他境，至暹与罗斛合为一国，始于元至正间，其先皆居八百媳妇边外地，与

^①陶云逵：《关于暹罗改国名为“泰”》，载《益世报》专号，民国28年（1939年）6月。

^②顾颉刚：《暹罗改号与中国之关系》，载中国香港《天文台半周评论》，民国28年（1939年）9月。

^③顾颉刚：《暹罗改号与中国之关系》，载中国香港《天文台半周评论》，民国28年（1939年）9月。

爨僰邈不相涉”^①，抨击西方学者“南诏泰族王国”说提出的目的及泰国妄图建立所谓“大泰国”的野心，认为“……浅学之流，妄为歧视，外人不察，又往往以一部落之称呼，而有诸族之共名，使环伺吾旁者，得乘间抵隙，以嵩析吾民族，分裂吾版图，如近时暹罗，改称泰国，并依附掸族，妄为欲收复国土，建立掸族国家……”^②鼓励国内学者研究西南边疆史地，调查自己民族的语言、风俗和历史。

（二）早期国内学者对白族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

方国瑜先生是国内最早对白族起源与形成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暹罗政府全盘接受西方学者提出的“南诏泰族王国”说，将国号改为“泰”，妄图吞并中国西南疆土，建立包括中国云南、广西、广东等省以及部分越南、老挝领土在内的“大泰国”。针对暹罗政界与学界篡改历史、歪曲事实的行径，方国瑜先生应顾颉刚先生约稿，拟定撰写《僰人与白子》《叟与爨》《南诏之民族》《白衣与摆夷》《中国的云南》《暹罗与中国》数篇论文，“每一问题当详于系统与地理”^③，以中国历史发展整体论的理论为指导，从宏观历史与地理考释两个方面理清云南境内两大民族，即僰与爨的起源、发展历史，分析南诏境内的其他民族，探讨云南摆夷的族源发展，以事实阐述云南民族历史，即“瑜虽因暹罗学者误解史事而作，然纯为史实之陈述，不欲因宣传而曲解历史矣”。^④

1939年10月，方国瑜先生相继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僰人

^①周钟岳：《云南各夷族及其语言研究序》，载《新动向》第三卷第三期，民国28年（1939年）8月出版。

^②周钟岳：《云南各夷族及其语言研究序》，载《新动向》第三卷第三期，民国28年（1939年）8月出版。

^③方国瑜：《僰人与白子》，载《益世报》1939年10月2日《边疆周刊》，第四十期。

^④方国瑜：《僰人与白子》，载《益世报》1939年10月2日《边疆周刊》，第四十期。

与白子》《僰人与白子（续）》两篇论文，痛斥暹罗亲王共丕耶达吗銮拉查奴帕在《暹罗史》中论述的观点，说到：“此与吾人所知之史实，绝不相容。达吗銮拉查奴帕，虽在暹罗为有权威之史学家，而于中国历史，所知甚陋。”^①方先生考校历史，提出“僰人绝非摆夷，而为今白子之先民”。^②他分析了将僰人混为摆夷的原因，认为僰人向为白人的称谓，直至明朝李元阳纂修万历《云南通志》时，将其称为白人，而以“僰”称摆夷，即僰夷，才产生将“僰人”认为是“泰人”的误解。在此基础上，方先生根据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考证僰人的族属与起源，提出僰人源于汉人，后与羌人融合，汉晋时期南下进入南中地区，发展成为昆明族。两汉魏晋时期，昆明散居在南中各地，以滇东北为最盛。到了唐代初年，昆明人虽仍然散居各处，但以滇西最盛。随着属于叟人族系的爨氏崛疆南土，争长称雄，昆明人渐向西南移殖，聚居于嵩州以南至西洱河附近，称之为昆明蛮、松外蛮、白蛮。“元代史事，屡见僰人之称，即为汉晋之僰人，唐之白蛮，今之白子，可无疑义。”^③据此，方先生总结为“自汉以来，云南有僰人，僰人之始，为汉族支裔，迁至西南，与羌混合，而文化较他民族为高，汉晋设郡县于云南，僰人随政治势力分布各地，与爨部为云南民族之两大系。齐梁以后，爨部强于建宁，僰人乃聚而处西洱河附近，为南诏大理国之主要民族，元明以来，新汉人大量迁至云南，僰人与之混合，已无分别”。^④方先生十分强调汉文化对僰人的影响，他认为正是由于“僰人汉化日深，已与汉人无别，迨万历间李元阳纂修《云南通志》，以‘民’字代景泰志之‘汉僰’，间称为白人，而称摆夷为僰夷，名号之乱自此始”。^⑤

同时，方国瑜先生又发表了《僰人与白子》的姊妹篇《南诏是否泰族国家》，再次对“南诏泰族王国”说进行更深刻地驳斥。方先生批评国内

^①方国瑜：《僰人与白子》，载《益世报》1939年10月2日《边疆周刊》，第四十期。

^②方国瑜：《僰人与白子》，载《益世报》1939年10月2日《边疆周刊》，第四十期。

^③方国瑜：《僰人与白子（续）》，载《益世报》1939年10月9日《边疆周刊》，第四十一期。

^④方国瑜：《英人与白子（续）》，载《益世报》1939年10月9日《边疆周刊》，第四十一期。

^⑤方国瑜：《僰人与白子（续）》，载《益世报》1939年10月9日《边疆周刊》，第四十一期。

学者研究南诏民族，不求之于国史，而附和欧美学者，认为南诏为泰族是错误观点，强调元代及明初所谓的僰人，断非摆夷，而是白子，摆夷在当时则称百夷、白夷、伯夷或白衣，认为“吾人以遍寻中国史料，既不能证明南诏为泰族，又可逐处证明南诏非泰族，则舍中国史料而倡与之不能相容之说者，非愚则诬也”。^①

历史学家范文田先生也对白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进行了研究。1943年，范文田先生赴昆明途中，因交通原因暂留大理五台中学任教。在这一时期，他研究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写成《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一书，陆续发表于《东方杂志》，全书于1944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

《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一书，以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观为指导，分析了西南夷族类及其名称、分布地理和生活状况，探讨了云南民族的源流及发展，重点对云南古代的两大族，即爨与僰的族源和发展进行了研究。范文田先生认为：云南的民族，是从甘肃、青海、西康高原等西北迁徙而来，故此两部分之人种，皆以氐羌为主，具与华夏有血缘关系，其率有不少部族，皆夏族之苗裔也。羌族发展为罗罗，氐族发展为明家。同时，他对涉及白族起源和形成问题的乌蛮、白蛮的含义，关于“昆明”、“诏”之解释，以及明家族之源流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范先生认为明家源于氐族。汉晋以降迁到云南的氐族部落，到了唐代发展为洱海区域的松外、青岭、勃弄、河东、洱河诸白蛮，他们与共为西爨白蛮部族的王室蒙氏共同建立了南诏。且由于蒙氏与松外诸部长期与汉人杂居融合，汉化已久，其生活及文化，已构成汉族之系。大理国则由系出陇西白氏的段氏建立。由于南诏、大理国均为白氏后裔建立，至元明时期发展成为明家人。明家人主要集中在环洱海区域各地。此外，在昆明、安宁、昆阳、澄江、呈贡等地都有分布。

^①方国瑜：《南诏是否泰族国家》，载《新动向》第二卷第六期，民国28年（1939年）12月出版。

李群杰先生说：“范义田是二十世纪中叶云南很有才气的学者，他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探讨教育，研究民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①林超民先生则总结了《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一书，认为该书具有四个特点，即①从中华民族类的整体分布格局中探寻云南民族的分布和族系，按《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录的族类，以及后来的相关记录，将云南的民族，分为罗（爨、黑夷）、氐（僰、明家）、苗（瑶、沙）、摆夷（金齿、文濮）四大族类。认为“这个分类今天看来未必妥当，但是这个分类是20世纪对云南民族最早的分析，摆脱了以往民族记录的笼统、模糊的弊病，为科学分析云南族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②②突出云南地方历史的特殊性。③以生理活动之差别，也就是以文化差异、文化认同作为族类区别的基本原则，“将文化差异、文化认同作为族类区别的原则，应该说与民族的科学定义虽有距离，但已经十分接近了”。^③④对白族史研究的创新。

范义田先生在《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一书中对于白族起源和形成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值得商榷，如对“昆明”的阐释、对“明家”的解释等，因此，王吉林先生认为“其书头绪太乱，比附过多，牵强之处，所在多有，故不为人所重视”。^④尽管如此，范先生的著作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正如林超民先生所言：“作为第一本研究云南民族历史的创新之作，《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也存在若干明显的不足。但是瑕不掩瑜，这些不足有诸多客观原因，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否定60多年前的拓荒之作，相反，在云南民族史取得新进展的当今，我们不应该忘记范义田先生的开创之功！”^⑤而范先生“在书中对白族（明家）的历史文化作了系统、

^①李群杰：《范义田文集序》，载余嘉华主编《范义田文集》（上），第14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②林超民：《云南民族史研究的开创之作——重温范义田〈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未刊稿。

^③林超民：《云南民族史研究的开创之作——重温范义田〈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未刊稿。

^④（中国台湾）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第6页，（中国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2年版。

^⑤林超民：《云南民族史研究的开创之作——重温范义田〈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未刊稿。